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 | 总主编◎文 旭

创伤小说的记忆书写

刘 玉◎著

Writing Memory in the Trauma Novel



科学出版社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

总主编◎文 旭

创伤小说的记忆书写

刘 玉◎著

Writing Memory in the Trauma Novel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创伤小说文类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本书基于文化创伤理论,对创伤小说的三个记忆维度展开研究,即潜伏性、延迟性和反复性。首先,本书从文化创伤概念化和理论化切入,厘清创伤小说文类界定的问题。其次,本书通过研究希尔科、厄德里奇、吉尔曼、莱辛、豪、韦斯特、冯内古特和莫里森等作家的主要作品,探讨了这三个记忆维度的作用机制和相互关系,并指出创伤小说的文类特殊性在于对记忆主题的再现。

本书适合高等院校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专业师生、其他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伤小说的记忆书写 / 刘玉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3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 / 文旭总主编)

ISBN 978-7-03-060073-8

I. ①创… II. ①刘… III. ①小说研究—美国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1645 号

责任编辑: 常春娥 / 责任校对: 何艳萍

责任印制: 徐晓晨 / 封面设计: 铭轩堂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1000)

201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4

字数: 175 000

定价: 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

编 委 会

总主编：文 旭

编 委：（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陈新仁	陈永国	程晓堂	董洪川
杜世洪	封宗信	韩宝成	李 力
李洪儒	刘承宇	刘立辉	刘正光
罗益民	马海良	彭宣维	钱 军
冉永平	束定芳	王文斌	魏在江
向明友	晏 奎	杨 枫	杨金才
张 辉	张克定	张绍杰	张绍全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创伤的时间
维度研究”（项目批准号：08BWW013）的结项成果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SWU1709121）
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SWU1709236）资
助出版

丛 书 序

外国语言文学博大精深，其内容涵盖外国语言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外语教育研究及跨文化研究等。在我国，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历史悠久、成绩斐然。近些年来，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发展迅猛，其理论与模式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尤其在研究领域方面，其跨学科性和交叉性日益凸显并普遍，如与哲学、符号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等众多领域的日渐交叉和融合，促使我们必须多维度、多视角、多层面地进行研究，从而在科研上真正做到有所创新、有所前进、有所作为。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研究已是当今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当然，无论是从学科研究历史传统的传承上来看，还是从其未来发展的开拓创新上来说，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都任重而道远。因此，与时俱进，汇聚外国语言文学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为先行者和后学共同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便成为促进学科发展极为重要的一环。为此，我们秉承西南大学“特立西南，学行天下”的大学精神，在学界广大同仁的关心和帮助下，精心打造了“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系列学术专著，以期促进外语界同仁相互沟通与交流，共同创新与进步。该系列学术专著的规模化出版，是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科学研究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其诞生是学院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必将进

一步搭建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成果交流的平台。

西南大学起源于 1906 年 4 月建立的川东师范学堂，于 2005 年由原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而成，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西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学贯中西的大师吴宓先生，著名诗人、文学家方敬，翻译家邹绛、外语教育家张正东等学术先贤和著名专家曾在此执教，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和办学特色。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拥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及“翻译硕士”

ii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同时接收国内访问学者。学院拥有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西部地区外语教育研究会、重庆市外文学会、重庆市莎士比亚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或团体。学院现有多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在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功能语言学、莎士比亚研究、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翻译研究、外语教育学等领域有较深的造诣，并在多个全国性学术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改革开放以来，学院秉承“博学中西，砥砺德行”的院训，以“崇尚学术自由、培养外语英才、塑造模范国民”为使命，以“全人教育思想”为外语教育理念，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在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外语教育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学术价值大、实用性强的科研成果，多次获得全国和部市级的教学科研成果奖，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西南大学和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学科建设的大力资助，外国语学院在许多教师以及各界朋友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尤其离不开科学出版社阎莉女士的真诚相助，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诚然，这个新生婴儿的成长与发展，要靠广大学人的呵护和支持。因此，敬祈学界朋友不惜赐教为幸，也热忱欢迎同行专家不吝赐稿。我们将秉承西南大学“含弘光大、继往开来”的校训，继续不遗余力为本丛书的成长壮大添砖加瓦。

为学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共同的事业就是共同的生活情趣，也是共同的追求，“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思考求索的起点，追寻学术的真谛，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是为序。



2014年6月22日

谨识于西南大学

目 录

丛书序

引言	1
第一章 文化创伤和创伤小说	14
第一节 创伤的文化转向	16
第二节 创伤小说的兴起	31
第二章 潜伏的记忆	52
第一节 美国印第安女性文学的生态情怀	53
第二节 蛰伏的去殖民化理想——《典仪》	63
第三节 隐匿在历史编撰中的故事——马其曼尼托湖系列小说	80
第三章 延迟的爆发	97
第一节 癫狂的觉醒——《黄色壁纸》	98
第二节 延伸的仇恨——《野草在歌唱》	120
第三节 穿越时空的复仇——《灵女》	133
第四章 反复发作的梦魇	145
第一节 找寻失去的记忆——《士兵回归》	148

第二节 过去即现在的记忆迷宫——《五号屠场》	157
第三节 充满苦痛的身体记忆——《宠儿》	170
结语——创伤拒绝遗忘	190
参考文献	196
后记	207

引 言

一旦发生不幸，我们往往劝慰幸存者：忘记一切，从头再来。忘记一切，即抛开痛苦的困扰，放下精神包袱；从头再来，则是要开启新的人生道路，继续前进。忘记确实是一剂良药，奥德修斯（Odysseus）的手下食莲忘忧，不再痴念归家；这些忘记家乡的人虽不再思念，远离漂泊和危险，却永远地留在他乡。食莲人的遭遇，既可比喻我们对幸存者的劝慰，也可警示遗忘的后果：流离失所。这里的流离失所，可以是身体离开熟悉的地理环境或社交圈，也可以是心灵迷失、不辨自我。可见，假使世间真有忘忧草，其代价也会非常昂贵。况且，忘却或能愈合伤口，却不能抹掉疤痕。即使用灵药使疤痕转淡，甚而消失，那诸般痛苦也早已铭刻于心，成为自我的一部分，无从割舍。因此，幸存者往往经历过无数挣扎和努力之后，才发现自己从来不曾忘记，而新的起点其实是原来的终点。

既然很难忘记，何不认真回忆？或许，回忆才是应对伤痛的良方。回忆，顾名思义，指回溯记忆或重访记忆。但是记忆本身有时效性，人脑对记忆还会加以筛检，因而大脑能保存下来的记忆并不一定真实、完整和准确。换言之，回忆不一定能忠实地再现彼时彼地的事件和感受。倘若这般，回忆的这种变量是否会因此削弱记忆的作用和意义？显然不会。因为记忆偏差的消极影响远逊于记忆本身的积极力量。记忆之于历

史、文化、艺术、人类经验、情感、交往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缺少记忆，还原历史真相无从谈起；缺少记忆，文化无法反映群体的思想、行为和风俗；缺少记忆，艺术将失去灵感的源泉；缺少记忆，人类的经验、情感和交往都将陷入封闭的困境。记忆本身的力量，不会因为曲折的寻找过程或最终的变形而有丝毫减损，只会因为寻找而积蓄更多力量。所以，回忆或许会让当事人陷入痛苦，重新经历不幸，但是回忆也会如埃里·威塞尔（Elie Wiesel）所言，“是幸存者的道义所在，以便阻止敌人最后的手段——掩盖其罪行”^①。回忆让个体重新经历创痛的同时，也强化了个体经验对于群体的影响力。就此意义而言，回忆是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途径和策略。

如果是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某一群体遭遇的灾害性、恐怖性或毁灭性事件，经过群体内外的共同追忆，形成一段共享的集体记忆，那么这样的集体记忆就是本书所要讨论的文化创伤。文化创伤不是当下现实的摹写，而是一种回忆，因此反思是记忆的核心所在。回忆是对过去的怀念和铭记，而不单纯是为了还原过去。时间的脚步不会因为人类的美好愿望而停歇，所以旧日时光也不会真正重现。但是我们总会因为过去的美好、精彩、悲伤或苦痛去回顾往昔，因为过去就仿佛如影随形的包袱，抛之不去。饱受苦难的人尤其如此，因为痛苦的过去，并不是那么能轻易抛却的包袱。倘若要继续前进，背负苦痛过去的人须得认真回忆

^① Elie Wiesel. "Preface to the New Translation." *Night*. Trans. Marion Wiesel. NY: Hill and Wang, 2006. viii. 本书研究对象为英美文学作品，涉及的一手文献和二手文献大部分是英文文献，书中所引用的英文文献的中译文均为笔者翻译，特此说明。

和反思。这既是为真正走出阴霾，也是为警醒世人，以防过去的悲剧重演——这正是威塞尔宁愿承受回忆的痛苦也要坚持记录的用意之所在。也正是因为有了许多和威塞尔一样宁愿备受痛苦煎熬也要执着书写的人，不同群体的悲剧才能得以为后世知晓，生活在不同时期的人才能了解到同样的伤痛和苦难，人类所犯之错误、愚蠢和邪恶才能不被遗忘并警示后代。其实，我们应该知道，伤害不仅会针对人，而且会加诸集体、社会、文化上。同时，有些伤害不容易痊愈，伤疤不会完全消失，总会留下似有似无的伤痕，时不时提醒人忆起曾经遭遇的痛和泪。总之，有些人、有些话、有些事不会因为退出历史舞台而淡出集体记忆，相反，他们会因为是文化创伤的一部分而得以长久保存。

的确，历史拒绝遗忘，而文化创伤正是对抗各种历史健忘症的良方。历史总是在重复，错误总会重来，比如战争并没有因为其实质被揭露而淡出人类社会。或许，我们更信奉“忘记一切，从头再来”，为了重新开始，不惜忘记一切，包括经验和教训。又或许，过去的错误太过丑恶，令人惭愧并备感羞耻，所以我们的记忆自动将其封存。钱钟书曾写道：“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①不仅惭愧让人健忘，耻辱、痛苦甚至疾患也会让人情愿选择忘却。但是，遗忘可能导致历史重演，历史健忘症不仅是自我麻痹的安慰剂，也可能充当诱人走向迷途的致幻剂。一旦忘记历史，我们会不断卷入冲突和征战，会自鸣得意地重

^① 钱钟书：“小引”//《干校六记》，杨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页。

复前人的狂热和暴戾，会难以面对自己的愚蠢和耻辱。唯其不忘历史，方能正视邪恶；唯其反省自己或他人的错误，方能避免重蹈覆辙。因此，我们需要记住，哪怕伤痛，哪怕耻辱，哪怕罪恶。

本书所要探讨的，正是铭记伤痛、耻辱和罪恶的文化创伤如何借助小说这一形式，用艺术真实地表征历史真相。第一章“文化创伤和创伤小说”是本书的理论思考。首先梳理概念的由来，引入“文化创伤”的概念。从词源入手，“创伤”（trauma）一词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是描写战争冲突留给人伤害的常用词汇，最初指钝器穿刺人体造成的伤害。这一词汇的早期使用表明，创伤包含了至少两重含义：冲突和伤害。17世纪时，trauma进入英语词汇，主要用作外科医学术语。而这个词真正炫目登场，则是要等到200年之后。19世纪，现代心理学迅速发展，从保罗·奥本海姆（Paul Oppenheim）的创伤性神经症，催生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创伤的概念。弗洛伊德为心理创伤概念集大成者，他对这一概念的临床使用和理论建设功不可没。弗洛伊德的心理创伤理论，还揭示了心理创伤的三大特点，即潜伏性、延迟性和反复性。这三大特点，将在本书探讨文化创伤概念化和理论化时，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文化理论的发展，进一步推进创伤研究，此时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为个体。其实，弗洛伊德早已尝试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探讨宗教、社会和文化问题，但囿于方法和视野，他的研究难以达到预期的深度，无法对特定宗教、社会和文化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虽然弗洛伊德的集体心理学研究或许不及其他方面的成就，但他的这一尝试，为心理学研究方法走入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

开启了思路。21 世纪伊始，以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C. 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为代表的研究团队，提出“文化创伤”概念，并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思考，努力完善此概念的内涵，并希望将这一概念进一步理论化，使其成为相对独立和有建设性的理论体系。“文化创伤”概念并非突兀生成，而是在集体创伤、民族创伤和历史创伤的基础上，由亚历山大等人重新提出的概念，用以满足新历史时期的研究旨趣。相较于前三个同样文化定位的创伤概念，文化创伤似乎更能摆脱狭隘的历史主义和二元论的束缚，因而具有灵活和包容的适用性。当然，概念和理论的取舍，无法回避研究者的主观偏好。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主观性，才能更好地推进理论研究和创新。

梳理文化创伤的概念化和理论化过程之后，本书紧接着提出：文化创伤是以小说为代表的当代虚构文学的重要题材和主题，因此衍生的新次文类创伤小说则是文化创伤建构中的重要和必要元素。历史和虚构文学之间的关联一直是颇受争议的话题，虚构文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虚构的本质是否会削弱甚而剥离文学和历史的亲缘关系？本书认为，虚构文学中的真实可以不受特定历史时间的局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影响到更多受众。相比之下，历史真相受时间性的限制，也因此更加具体和特殊，缺少文学传递和延续的普遍性。不过，二者对立和割裂的情况，却在一种新次文类中得到调和，并焕发出更新、更强的影响力。加拿大学者罗纳德·格兰诺夫斯基（Ronald Granofsky）和英国学者安妮·怀特赫德（Anne Whitehead）曾先后尝试梳理这一新次文类，他们使用的概念虽略有不同，但并不妨碍中文“创伤小说”的

唯一性^①。然而两位学者对创伤小说的界定和梳理却不完善，未能揭示文化创伤对于创伤小说文类确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本书借鉴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在其基础上提出：创伤小说是以再现个体创伤性经历或群体灾难性经验为题材，表达身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主题，并且努力尝试用新叙事手法的新次文类。创伤小说因对文化创伤的反思和再现，主动参与到文化创伤的建构中，成为文化创伤跳出特定历史事件的重要媒介^②。

本书第二章“潜伏的记忆”的研究对象是以生态、土地、印第安人和白人冲突、历史编纂为主题的美国印第安小说，研究问题是这些故事如何建构文化创伤，研究目的是揭示印第安人生存故事中潜伏的印记或记忆。该章首先概述美国印第安女性文学的生态情怀。为什么考察印第安女性文学的自然观？对很多印第安人而言，哥伦布登陆美洲之后，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遭受巨大冲击并被迫改变：放弃或遗忘固有的母系社会形态。在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很多印第安部落尚且保留着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结构，妇女在部族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 1492 年之后，实质性的印第安人和白人接触以血腥、暴力和一边倒的方式揭

① 格兰诺夫斯基在专著中使用的是 trauma novel，而怀特赫德的书则采用了 trauma fiction。就词义区别而言，novel 较为狭隘，并多指篇幅较长的小说，而 fiction 则更宽泛，篇幅长短不拘的故事，都可谓之 fiction。

② 因为亚历山大在将“文化创伤”定义为“恐怖事件的受害群体感受到其群体意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时，显然暗示了一种历史时间的存在，而这一历史时间势必会削弱文化创伤之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但创伤小说显然不受此局限，因为虚构文学特有的艺术真实，能够超越历史时间的桎梏，让亚历山大所言之“印记”历久弥深。

开序幕。白人的思维、意识和生活方式强势渗透进和瓦解了很多印第安部族传统的母系社会形态，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不过，这种成功并未彻底抹杀掉印第安人对土地、历史和民族的记忆，同时这种成功引起印第安学者和作家的深刻反思，其中以女性为中心的自然观成为印第安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铭记于心的文化记忆。及至 20 世纪 60 年代的印第安文学复兴，印第安学者和作家从反思转为批判，方式和内容也更为积极和深刻。他们之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作家，这些女作家致力于表达以女性为中心的生态情怀，再现印第安文化价值，以期唤醒族人潜伏的伤痛记忆。

紧接着，研究对象转移到其中一位重要的印第安女作家，她是莱斯利·马蒙·希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希尔科的代表作《典仪》（*Ceremony*）用一个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困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的故事，揭示出主人公塔尤的身体创伤、心理创伤和印第安文化创伤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表面上，《典仪》是一部展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患者的不幸遭遇和疗伤过程的小说，但其实质却是在探讨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个体，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和自救。希尔科的答案不是去医院，也不是回归保留地，而是开始寻找家族记忆和土地记忆的旅程。当塔尤回忆起自己母亲的遭遇，回忆起儿时内心的耻辱和痛苦，回忆起家园曾经的模样，回忆起土地的气息时，他才能真正找到引起生理病症的病灶，并找到治愈疾患的良方。

此后，该章通过解读路易丝·厄德里奇（Louise Erdrich）的马其曼尼托湖系列小说，即《情药》（*Love Medicine*）、《甜菜女王》（*The Beet*